

推进“文革”研究进入历史学学术轨道^{*}

——兼论中国“文革”研究的现状和前景

金大陆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2)05-0160-05

作者简介: 金大陆,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 200235)

2007 年以来, 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指南《中共党史》研究栏目中, 曾列“要注意对‘文化大革命’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对有关问题的研究”等内容。就此, 说明“文革”研究尽管仍处于或艰难、或微妙的状况, 却也并非如坊间传说那样遭遇“禁闭”的境地。事实上, 党史、国史研究机构关涉“文革”内容的成果, 仍缓慢而又不间断地出版问世, 包括历时十六年编写的《党史·二卷》, 直接反映“文革”内容的第三编共计八章, 这些研究的优势在于研究者可以查阅许多外界不方便接触的资料, 为“文革”研究构筑了第一轮次的史料基础。同时, 因其“政治标准”比较统一, 比较严格, 于是在史料的取舍上, 在框架的搭建上, 甚至在行文的格式和尺度上, 均有可能因服从高规格的“政治标准”, 而欠缺学术争鸣与学术探究的弹性。当然, 因有关方面规定“文革”选题必须送审, 致使更多的出版社, 或者为政治敏感所困, 或者为地位利益所累, 多自动地回避和放弃, 便为整个社会造成了禁闭“文革”研究的舆论认定。

其实, 近年来因各方面境况和情势的变化, 海外的、学界的, 尤其民间的“文革”研究, 已出现了“涌动”之势。

先看海外的研究。国际上的“文革”研究伴随着“文革”运动的爆发而展开, 但因冷战思维的需要, 此阶段的研究多集中于情报分析和政治战略性质的研究。至上世纪 80 年代后, 因海外机构存有大量的资料积累, 便逐步呈现学术性的研究倾向。当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成为新一轮“中国问题研究”的热点后, 海外的“文革”研究曾一度降温, 也即进入了一个可称为“沉着”的阶段, 于是, 表面上是研究人员和研究著述在减少; 实际上则是更多的资料在流动和汇聚, 更有志趣的学者在成长。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 海外“文革”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具体表现为大批资料的整理; 学术活动的举办和研究方向上向社会、专题和区域等方面转变。但经综合考量, 外籍学者普遍缺乏关于中国“文革”研究所需的“深部”和“细部”的资料。同时, “文革”终究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故事, 不仅时间长达十年, 空间跨越全境, 上至最高领袖, 下及万千民众, 更因“文革”运动的整个过程波澜起伏、错综复杂, 各派关系、各路人马纠缠缠扰, 且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权的政治路线及各种各类人群的历史渊源和纠葛、社会人情和世故息息

收稿日期: 2012-02-11

^{*}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上海文化大革命史料留存和分布情况调查研究”(项目批准号: 2008BDS003)的研究成果。

相关。对此,一般外籍学者尚缺乏“中国式的体悟”。所以只有依靠中国学者,甚至只有取决于中国学者作出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才可能真正提升“文革”研究的层次和品质。近年来,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跨出国门的华人学者,进入了“文革”研究领域。他们一般既有“文革”经历,又有学术背景,便在材料辨识、路径判断、框架结构和叙事表述上,具有外籍学者不可比拟的优势,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着海外“文革”研究的制高点,并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国内。

再看国内学界的研究。按理说,国内学界主要是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研究人员,应该站在中国“文革”研究的前沿,因其更具资源和学识上的优势。但事实上,针对“文革”研究的种种“制约性”措施,恰恰最大程度地限制了学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直接而实际的原因,是对“文革”研究的制约所造成的史料开掘和成果发表的艰难,与学界的积分式考评制度形成不可通约的冲突。以至学界中对“文革”研究有志趣、有想法的人员,面对考评、升职等严峻现实,不得不选择等待或放弃。间接而客观的原因,则是对“文革”研究的限制所造成的政治上的敏感和障碍,使一批认同“文革”研究价值的学人,在第一时间就选择了回避、观望和等待。久而久之,当这批学人在不同的学术方向上积累了资源,成就了事业,尽管仍对“文革”研究葆有兴趣和想法,客观上已没有精力实施新的学术转向了。然而,没有学界的全面参与,只能标志中国“文革”研究在整体上仍处于“低水平状态”中。反之,甚或导致“文革”研究在非学术的轨道上(戏说、妄说等)越走越远。

当然,从另一个向度看,仍有一些学者在坚持,近年来,这股势头还有所拓展。据不完全统计,至 2011 年全国可查“文革”题材的硕士论文 99 篇,博士论文 54 篇,共计 153 篇。且越是往后的年份越是增多,明显呈现“爬坡”的态势。上世纪 90 年代的“文革”题材的硕博论文,除 5 个篇章由北大、华师大、人大和南大产生,其余 21 个篇章均来自于中央党校,占 80.8%。而进入本世纪以后,重心转向了各地重点综合性大学和各地师范类大学,据目录中涉及到的学校,共计有 47 所。另据硕博论文的选题情况,排在第一位的是“文革文学”类的研究,关于“文革理论”和“文革运动”的研究列第二位。这种基于对“文革”题材的文学作品的评析和偏重于政治层面的理论分析和推断,均机巧地避开了爬梳“文革”资料的艰难,以及深入“文革”运动的内部开掘问题的挑战。这正可判定中国的“文革”研究尚未真正进入历史学的轨道。

同时,据不完整信息,近年来,北大、复旦、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均探索性地开设“文革”类课程。比如,在复旦不仅历史学系设置课程,正式招收“文革”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政治学系(偏重于“文革”时期行政管理体制的研究)、社会学系均有选修课程。在资料建设方面,北大、清华等建立了“文革”资料整理互通系统;复旦历史系和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共建“上海文革研究资料库”;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资料库中藏有相当数量的基层“文革”档案等。在组织学术研讨方面,如 2009 年 4 月,清华大学邀请瑞典隆德大学沈迈克教授到该校演讲《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的写作题旨,并回答了“文革”研究的许多问题;2011 年 12 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京召开“第二届文革史学术研讨会”等。应该承认,这些动态和信息,确实反映了中国学界“文革”研究的进步,以及其内在的趋动力在不断地积聚和增长。但这种以学者的努力为支撑的进步,尚未形成“以点连面”的呼应和阵势,它还需要时间,或许更需要时运。

最后看民间“文革”研究。相比学界的情况,民间“文革”研究超脱了体制、行政及种种相关指令的约束,正率先出现“突破”的状态。这是因为不管曾是官员还是百姓,多数民间“文革”研究者处于退休的状态。于是,有了充裕的时间,部分人手中的经济支撑尚比较坚强,加上民间“文革”研究者多是“文革”运动的亲历者(甚或是重要人物)。于是,在时隔“文革”爆发四十多年之后,从青少年时期的经历跨越到晚年的回顾之时,因深感“文革”研究对历史、对当下、对未来的价值,便产生了诉说的冲动;产生了抢救、积累资料和研究的需要。具体则表现为大量撰写回忆录、大量接受访谈、大量聚会研讨,以及通过香港出版机构或自印本、

现代网络技术等形式问世。近年来北京、上海、四川、武汉等地,均有当年的“文革”参与者组织各种形式的聚会和讨论,如 2010 年 11 月,原北京地质学院一批“文革”亲历者聚会,商讨写作《地院“文革”史》,此类活动在清华大学、北京男四中、北师大女附中等校友中均有展开,有的甚至因细节辨析和观点分歧而发生激烈的争论。上海方面也有当年的大学“红革会”、中学“中串会”及上海中学等人员,在筹备撰写回忆录等。2011 年 8 月和 10 月,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分别召开会议,座谈海外学者所著的《找寻真实的林彪》和《决议》发表三十周年。2011 年 5 月,以“文革”美术印刷品收集整理为目的的“考史堂文革资料研究交流中心”在京成立等。

近年来,以纸媒形式呈现的民间“文革”成果大量在香港汇聚,香港甚至专门成立了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其基本分为两个路径展开:一个路径是学者的研究著述,如唐少杰的《一叶知秋:清华大学 1968 年“百日大武斗”》等。还有一些关涉“文革”主题的大型项目也在香港策划和出版,最典型的是电子版《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和纸媒版十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被称为“目前最具规模的大型中国当代史研究著述”)。另一个路径则是各种“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录,如毛毛的《我的感情流水帐:父亲邓小平“文革”十年记》(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 2000 年版);徐景贤的《十年一梦》(时代国际有限公司 2004 年版)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吴法宪回忆录》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以后,邱会作、黄永胜、李作鹏等集体性地在香港推出回忆录。就此看来,不管是“文革”运动中的刘邓一路,林彪一路,还是王张江姚一路,只要是能说的(如访谈录),能写的(如回忆录、研究著作),多集中到了香港——香港地区成了中国“文革”出版物的集散地!这说明开展中国“文革”研究的内在动因,不管是在什么层面上(政界、学界和民间),什么阶段中(过去、现在和将来),什么境况下(禁闭、限制和开放),始终是在运动和作用之中,始终是在酝酿和寻找着突破之处,而香港便成了这座“方便”之门。然而,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出版物通过往来的商人、游客,成批量地进入中国大陆,更有内地的不法书商大量盗印后,肆无忌惮地在各大城市的高校门前销售,形成了这些书虽不能在内地出版,却能以盗版的形式在内地广泛流行的滑稽局面。如此发展下去,所有认定“文革”研究“不方便”的理由,将全部被从“方便”之门中冲出来的潮流席卷而去。

与此同时,近年来民间“文革”研究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不仅搜罗、转贴各类“文革”文章,还创办了定期或不定期的网络版“文革”杂志,在网上广泛流通,并产生很大影响,主要有《记忆》、《往事》等,海外有《文革博物馆》。《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自我定位为“民间、专业、小众”。三年多的时间已出刊 79 期,近 500 万字。《记忆》甚至引起了海外学术界的关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请求订阅该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均请求授权打印,并永久收藏。《往事》亦已发行一百多期。2010 年 11 月,“以回忆、思考四川现当代历史”为主旨的《蜀道》;2012 年 1 月,以“抢救文革回忆,积累文革资料,交流相关信息,促进文革研究”为宗旨的《昨天》,均以民间电子刊物的样式宣布问世。

首先应该承认,民间“文革”研究的开展是一件好事。它起码说明“文革”研究存在着较为厚实的群众基础,有一部分人愿意为恢复历史真相、探寻历史奥秘、总结历史经验出钱出力。况且,尽管民间“文革”研究多偏重于基层的、自我的位置和态度,许多第一手资料的披露,许多亲历见闻的记述,仍然难能可贵。其次应该承认,因当下的民间“文革”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当年的参与者,且当年的参与者各有自己的境况和立场,许多民间“文革”研究的事实,也证明这些参与者在表述中多有维护和申辩。这就有可能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当与现实政治发生或显性、或隐性的联系之后,将变得更加缠绕和复杂,那就是各路的民间“文革”研究有可能延续旧有的意识形态,完全脱离历史研究的轨道,背离研究历史的价值。

确实,当下的“文革”研究,已在选题、主题及理论、方法上呈现十分复杂的情势,甚或

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和争辩,那么,怎样的路径才是中国“文革”研究的正确方向呢?结论是——推进中国“文革”研究进入历史学学术的轨道。

“文革”研究在理路上有两个倾向值得注意:第一个是“图谱化倾向”;第二个是“意识形态两极化倾向”。

“图谱化倾向”亦称“脸谱化倾向”、“概念化倾向”(网上还有称“妖魔化倾向”),除了存在于一些碎片化的文章和一般思想史性质的论述推断中,在文学创作(含影视剧)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其主要原因是研究者、创作者或者凭借自身的经历,或者只靠一些摘编转抄,便对“文革”运动的来龙去脉、内在动因等十分复杂的问题,大而化之地进行逻辑推演,牵强附会地进行理论构建,这怎能不造成研究的单薄、粗陋和错乱呢!所以,主张中国“文革”研究进入历史学学术的轨道,首要的要求就是以求实的态度,以踏实的工作,以扎实的功夫,进入到“文革”史史料的开掘和整理中去(除了浮于面上的报刊社论、领导讲话等,还包括各类简报、动态、通知、信件、报告、报表、批示、总结、揭发、交代、会议记录、工作笔记、统计汇总等),否则一切都是既不着根基又不着边际的空谈。当然,档案禁闭是个现实的问题,需要不断呼吁。然而,是主动出击、四处寻求,还是等待现成的史料送上门来,却是判然不同、天差地远的选择和结果。殊不知,当下大量流散在民间的“文革”史资料,正为研究者的追寻、爬梳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复旦“文革”资料库拥有成千上万件的原始文档,正源于研究者不倦的追寻)。至于为什么强调“历史学”的学术轨道,而不是其他?恰是因为历史学的学科特点与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最大的不同,就是其总是面对过往的人与事,并依据材料说话。这种“史料为本”的特质,与最大程度地追求中国“文革”研究的学术品质是一致的。历史学的难度在于此,历史学的价值更在于此。

“意识形态两极化倾向”是中国“文革”研究亟待正视和解决的严重问题。“文革”研究伴随着“文革”爆发和“文革”终了均已数十年了,缘此,“文革研究”本身已构成了研究的对象。立足在这个视角,回溯并检证以往的研究,可知有“浩劫灾难”说、“权力争斗”说、“路线斗争”说、“社会冲突”说、“两个文革”说、“人民文革”说等种种的理论构架(或称“范式”),且多围绕着“文革动因”、“文革路线”、“刘少奇案”、“林彪案”等重大问题,企求给予确定的解答。

如果说这是多年来“文革”研究垒筑起来的平台,确实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研究的成果。那么,当这些观点和论述纠结着继续展开争辩的时候,便拉扯着向左、右两个端点迁移,以致形成了“两极化倾向”:一个可谓“集体罪错”说,即指认“文革”是高层政治的“集体罪错”;一个可谓“重要遗产”说,即认为“文革”具有人民自下而上追求平等的“遗产”价值。如果前说是一种终极性的批判思路;那么后说便是一种颠覆性的辩护思路。再仔细辨析,可发现这两个倾向充满着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更与当代中国政治的趋动紧密勾联,且着眼于宏大叙事和逻辑推演(非“史料为本”的历史学学术论证),力图在惯常的政治的框架内得出结论。应该承认,“意识形态两极化倾向”有较大的市场,也不能否认其在研究上各有存在的价值,但这种以意识形态为主导,极力呼应现实政治的路数,终究不是历史学学术研究的正道。

那么,主张“文革”研究进入历史学学术轨道,即标示着“学术至上”、“学术独立”的立场和态度,事实上是否可与意识形态切割呢?笔者在《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的“题旨与结论”中,有一论述可作解答:固然,“文革”运动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特征,甚或就是意识形态性质的革命,那就是既以“意识形态革命”为引导,又以“意识形态革命”为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文革”研究就难以回避“意识形态革命”的特征和影响,即不可避免地要搅扰在“意识形态革命”的漩流中——因为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立场”、研究的“方法”是可以剥离的。这就是说,即便“意识形态革命”是凸显的主题,是重要的内容构成,却不可以是研究的“引导”和“目的”(强调是“历史学”,而不是“政治学”的研

究)。在此，剥离不仅是学术的技巧和学术的智慧，更应是学术的自觉。尤其对一代“文革亲历研究者”（或称“亲历性的研究者”）而言，或许剥离是艰难又痛苦的蜕变，但不剥离是拖累的、陷落的、狭隘的；剥离了则是自由的、卓立的、宽畅的。因为只有坚持学术的立场，只有坚持以学术的态度审读史料和史实，只有坚持将“意识形态革命”的主题和内容，降落到历史学的文本中去粉碎、去梳理、去陶铸，才可能真正产生具有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作品。所以，“文革”研究能否进入历史学的学术轨道，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有清醒的认知和态度，由此，才能坚持“史料为本”，遵守学术规范，追求学术品质。固然，学术研究之间会有差异、有交锋，但只要是学术性质的，一切就是正常的和健康的。

但愿中国“文革”研究出现更多更好的学术作品。学术之树常青。

（责任编辑：陈炜祺）

Promot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Track
Jin Dalu

以求真求实的态度推进中国当代史的教学

金光耀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2)05-0164-02

作者简介: 金光耀,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上海 200433)

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已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相应地, 中国当代史的教学也日益受到重视。作为大学历史系本科基干课程——中国通史的最后一段, 中国当代史在各段通史中涵盖的时间最短, 因为从 1949 年开始的当代史, 在课堂教学中通常止于上世纪 80 年代, 前后不到 40 年的时间。但相比于涵盖几千年的古代史、上百年的近代史, 当代史的教学却并不因为时间短就更简单、更容易些。

与古代史、近代史不同, 当代史距离当今太近, 甚至可以说就紧接着今天, 使我们因为缺少距离感而增加了认清历史本相的难度,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尤其是当代历史中许多事件和人物与政治密切关联, 也使现实政治对当代史研究和教学的影响不可避免。如何应对这一影响, 考验着高校当代史教师作为历史学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和智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当代历史与政治密切关联的一个例子。《决议》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对 1949 年至当时的那段历史的总结, 它肯定了 32 年中取得的基本成就, 同时指出了党在 1957—1966 年十年间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和由此产生的左倾错误, 也全盘否定了“文化

收稿日期: 2012-02-11